



白沙滩古人类遗址



套木嘎遗址



套木嘎遗址考古挖掘现场

文化景址(一)

白沙滩古人类遗址

白沙滩古人类活动地位于镇赉县嘎什根乡丹岱村东北约2000米的嫩江南岸台地上,当地人称之为“大坎子”。其西北距黑龙江的泰来县西五家子村约2000米,正处在两省交界处。

白沙滩古人类遗址是1988年夏,吉林省考古学教授陈全家率师生在嫩江沿岸考古调查时发现的,当时采集石制品86件、动物化石45件。石制品有典型的楔形、船底形石核,工具有长身圆形刮削器、铸状器等;动物化石有10余个种属,其化石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。这些文物证实了早在一万三千多年前,这里就有人类生存。

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白城市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。2007年,白沙滩遗址被确定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套木嘎遗址

套木嘎遗址由“前套木嘎遗址”和“后套木嘎遗址”两部分组成,属于新石器时期至近代文化遗址。距今已有一万三千年,其考古与历史价值非常重要。

前套木嘎遗址位于大安市红岗子乡永和村,属敖包山中段,分布面积为3.7万平方米。这里的红烧土块甚多,经考古专家分析论证,此处应是一居住遗址。遗物有成堆的鱼骨、蚌壳、烧炭等,还有细石器和陶器残片。细石器有石镞、尖状器、刮削器、石叶、石核等,陶片有的施有篦点纹、刻划纹、粗绳纹、细绳纹、附加堆纹、乳丁纹以及由篦点组成的菱形、三角形、几何形图案等文饰。

后套木嘎遗址与前套木嘎遗址相距约1000米,该遗址南北长1000米,东西宽200米。早年,遗址中有一渠道沿着山冈走向穿过,渠道两壁内侧和渠道口,由于水土流失和农家取土而遍是坑痕。在季风刮出的洼坑和渠道底沟,蚌壳、鱼骨、兽骨和人骨历历在目。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蚌壳和鱼骨。在自然形成的风蚀坑里,裸露出大量各种颜色的细石器,俯拾可得。从渠道内侧两壁断面处,可见有厚1米的文化层,层内堆积着大量陶片,颜色有红褐和灰褐等,纹饰有附加堆纹、压印纹和连点纹。

地表上还见有乳白、淡黄、赭石、酱色釉的瓷片以及器物口沿等残片,也有陶质网坠和铁器残片等。这说明后来契丹人也曾在此地生活过。此处较大的新石器时期人类生活遗址1957年被发现,1958年吉林省文物工作者曾来此调查并定名为永合屯细石器遗址,1992年被吉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10年至2015年,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历时6年在此发掘,出土了大量文物,特别是距今一万年前的早期陶罐的出土,证明了白城这一区域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了陶器制品。该遗址考古还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中国北方考古教学基地。

(白城市文联供稿)

B 白城记忆

桃花占得八分春

●孟佳

三四月份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,这是春天来时非常繁盛、抢眼、明媚的花,因此有人说“春色十分,桃花独占去八分”。数千年来,桃花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:在农人眼中,她是重要的物候花;在诗人笔下,她是优美的诗词;在儿童的记忆里,她是渺远的神话;在画家的宣纸上,她是氤氲的水墨;在隐者心中,她是避世之所;在吃货口中,她是香饼美酒……

桃花在中国文化里出现得很早,说起桃花,人们会自然地想起《诗经》里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”的诗句。这首《桃夭》是用于婚礼上的祝歌,整首诗描绘了在桃花盛开的季节,璀璨年华的少女就要出嫁,她羞颜如彤、笑靥如花,背后繁英似锦、喜笑如火,处处是热闹欢乐的场景。清代学者姚际恒评说此诗“开干古词赋咏美人之祖”,仿佛直接将桃花与少女画上了等号。在此之后,才会有唐代崔护慨叹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

惆怅于风中;才会有曹雪芹为林黛玉代笔“若将人面比桃花,面白桃红花自美”的自比红颜薄命。

在中国的十二月令花神里,桃花是阳春三月之花,此时寒冷过去,不再有冻困之忧,食物也丰富起来,桃花天然就带有乐土的气质。因此在古人心中,桃花既是房前屋后的“家常花”,也是世人心中的“神仙花”,故而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念念不忘桃花源,那里芳草鲜美、落英缤纷,是一个桃花盛开、祥和安宁的世外仙境,是一个安居乐业、灾患不至的理想家园;一代才子唐伯虎也宣称“酒醒只在花前坐,酒醉还来花下眠”“别人笑我太疯癫,我笑他人看不穿”,惟愿长伴桃花、老死其间——唐伯虎醉眠的桃树下,是一片避世安心的净土,是一种与世无争、超然脱俗的生活方式;而在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故事开端,是一个说书人以桃花烂漫的视角唱:“小桃无主自开花,烟草茫茫带晚鸦。几处败垣围故井,向来一一是人家。”在南宋初年,淮

河流域是宋、金交战的前线,桃花兀自开如往昔,但故土却已物是人非——桃花无心的灿烂,对照着人世残败的荒凉,才让后来“侠之大者、为国为民,收复山河”的传奇故事更震撼人心。

桃花明艳热烈,灼灼动人,从中却也能读出坚毅之气。《山海经》记载夸父逐日的故事:“夸父与日逐走,入日;渴,欲得饮,饮于河、渭;河、渭不足,北饮大泽。未至,道渴而死。弃其杖,化为邓林。”夸父死时弃下的手杖变成了邓林,邓林即是桃林。正如陶渊明在诗中所说:“余迹寄邓林,功竟在身后。”桃林寄托的就是夸父的精神,是英雄为理想献身的象征,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屈与奋斗。而司马迁则看到了桃花的另一种美,他在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中以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来盛赞飞将军李广的讷言敏行,做事低调,不事喧哗而声名自著的高尚风格。而后白居易写下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”,最



初可能只是对一种特定的自然现象进行记录,却赋予桃花一种幽居不遇、孤芳自洁的人格意味。

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,开出千百年来中国人文化记忆中数不清的、繁华不败的美好意象。每当春风送暖,桃花盛开,也就开启了我们对于春天、对于这一年的美好希望。

续写蜀道传奇

●高大伦



蜀道上的石门栈道

国尤其是楚国的地理优势,是秦能一统天下的重要基础。

唐以后,在北方盛行的佛教石窟艺术主要是经蜀道传入四川,在巴蜀大地蜀道沿线上散枝开花,结出了中国唐宋佛教

石窟艺术最鲜艳的果实。

通过无数次实际行走的考古调查,蜀道有了更多的发现:在金牛道上的梓潼县发现了西汉汉郡郡治所在,在广元发

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创造出既能满足人们对时尚性、舒适度和审美观的要求,又能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和精神层面美好需求的产品

我看我说

通过创新传递文化自信

●龚良

在时间的长河里,中华文明始终传承有序,不同时期都有鲜明特征,通过当时人们的创造性劳动,生产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物质和精神产品,这既是对中华文化的有益传承,更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。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坚守中华文化立场、传承中华文化基因,这是新时代的召唤,需要我们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,逐步形成现代化进程中符合大众需求的时代特征。

新的时代特征,既要有物质产品的要求,更应有文化精神的要求,需要汲取了中华文化精髓并有所创新发展的时代产物。今天,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创造出既能满足人们对时尚性、舒适度和审美观的要求,又能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和精神层面美好需求的产品。

要实现这一创造,离不开考古探索发现、遗产保护传承和文化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。考古发掘研究应凝聚地域文明,遗产保护利用要立足传承发展,文化创意产业更要依托传统文化、立足生活需求。我们要创造的既有文化商品,又有文化产品,但他们都应具备属于今天的时代特征。

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,每一个文化文物工作者都可以大有作为。南京博物院努力让文物“活起来”,创造更多更加符合今人审美观和舒适度要求的文化创意产品。改扩建后的南京博物院,既保留中国建筑之固有形式,又创造出符合江苏地域特色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建筑外形,使建筑内外空间符合博物馆服务观众的需要。在展览方式上,我们也不断创新,策划“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化”系列展览,讲述传统生活之美。在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上,我们为其赋予中华传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要素,用精致美观的产品传递出我们的文化自信,既反映中华文化特色,也反映现代化美好生活的时代特征。

现代化,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,更应该是文化发展的现代化。在新的时代面前,需要我们共同努力,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,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,共同创造出为今人所喜爱、为后人所自豪的时代特征。

古书有陷阱(中)

好多“伪”得辨

●熊建

“朕今日说了这么多,就是想告诉大家,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,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,以国家强盛为己任,不骄狂,不自卑,正视现实,发愤图强。”

上面这句话来自头些年很火的一篇文章——“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演讲”,当时在线上线下的各种场合被人追捧:“说得太好了”“点明了传统文化的弊端”云云。很少有人去想,光绪到底没讲过这些话。

事实上,这篇演讲出自网络穿越小说《一个人的甲午》。如果稍有一些历史常识,从第一句话就能看出错误来。“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,正是西山红叶灿烂之时,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……”哪里错了呢?光绪十七年是公元1891年,而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建立。而且,“光绪”的整篇“演讲”中,除了“朕”字可以看出点儿古代味,其余皆与现代白话无异。有学者就说了:“如果当时的光绪能够说出那样一番话,就不需要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了。”

虽然早在多年前,就有很多人批驳过这篇演讲了,但时至今日,仍然有人在传,在信。明明是伪造的,却因为伪造有术,容易让人信以为真。这种鱼目混珠的情形,古书在流传过程中,也发生过,而且还不是少数,影响也颇为深远。

之前咱们聊过,古人喜欢编造故事,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。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社会动荡不安,战乱频仍,中原陆沉,文化事业受到摧残,因为传抄不易,很多古书就此灭绝。于是出了一些妄人,从编故事更进一步,假托古代作者,伪造古籍古书。其中,有位王肃,关

于他有一种说法,为了在学术争论中占得先机,接连推出托名孔子门徒的《孔子家语》,托名孔鲋的《孔丛子》。

这种造伪的风气持续了很久。隋朝平定天下后,向全国征求散失的书籍。大学者刘炫伪造了100多卷书,名之为《连山易》《鲁史记》等,以此求荣争赏。结果被人揭发,差点被处死,遭撤职后回乡靠教书过活。

中唐之后,独立思考,质疑辨伪的风气逐步展开。从刘知几、柳宗元,到宋代的郑樵、王应麟,再到明代的梅鷟,清代的崔述等,辨伪的学者薪火相传,对伪书、伪文、伪图,穷追不舍,深入揭批,让众多“李鬼”纷纷显形。

如果缺乏一种“打破砂锅(纹)问到底”的劲头,对很多伪造的东西,分辨不清,很容易盲从。而辨伪质疑的精神,多闻阙疑的思维,有助于纠偏补弊。

古文献学家张舜徽说过:“伪书虽伪,不可尽废。”古人造伪,大多为的是传播思想、经世致用,加上造伪时所使用的材料,往往是货真价实的,后来散失的史料,所以伪书的价值,是不可忽视的。

比如,儒家十六字心传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;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,虽然是出自伪《古文尚书》,但这句话的思想价值并不伪,应该是先秦儒家论述的予遗,依然可以视作应对艰难世道的一种精神坚守。

古书今读

掘了秦汉墓葬群和唐宋古窑遗址。在米仓道上找到了罕见的石栈遗存、唐代的郑子信修阁道题记,宋代修琉璃关道路题记。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抗蒙古城小宁城以及数量众多的古桥、古栈道遗迹。大量的明清修桥修路石碑。在荔枝道沿线发现多处多龛唐宋石窟,其中有数龛正是唐开元、天宝年间开凿的,令人遐思。这些考古新发现年代跨度大,许多是与道路本体相关的重要实证,为蜀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。

我们通过行走,可初步确认蜀道道路走向变化不大。这是因山脉河流走向所限定。蜀道本体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。第一次是南北朝以前,是以泥道和木栈道为主,所以刘邦能火烧栈道八百里;第二次大约是唐宋时期,许多地方木栈改为石栈,大约也就是李白的《蜀道难》中所讲到的“天梯石栈相钩连”中的“石栈”;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,在许多地段都铺成了石板路。因清初移民填川实施后,四川经济人口大增,经济繁荣起来,沿线人们有改善交通条件的迫切愿望。作为官道的金牛道本已修造得很宽敞,许多地方也早铺上石板路了,但作为民间道路的米仓道、荔枝道的石板路,多为民间集资或乡绅捐建,故道路桥梁铺设好后,或立石碑,或在石壁勒名纪事。

传统意义上的蜀道已经成为线性文化遗产。蜀道的保护利用不是建一个大博物馆或全路段开发那么容易,它的保护展示,需要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元呈现。既可以是让你记住乡愁的某个祠堂、土地庙的修复,也可以是捐钱修路碑群的成片保护。既可以是穿越诸葛亮北伐路线的复杂体验,也可以是中小学生周末或者假期肩挑背扛的栈道行走。既可以规划唐宋石窟艺术的研习之旅,也可以接纳成熟的团队旅游……

保护利用好这条古道,就是续写蜀道传奇。